

# 于斌樞機愛國思想溯源

陳方中  
輔仁大學

## 壹、前言

這次演講有新有舊，大部分是過去研究的綜合。基本上想要表達于斌樞機愛國思想及行動，是在什麼環境中孕育出來的。這個環境是多元的，同時也是隨著時間變化的，因此在同一個時代從其他視角觀察時，或是在另外一種時空狀態去理解時，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評價，但真正的歷史是要回到當事人或事件發生的那個環境，帶著同情理解的態度去面對。

于斌樞機的思想基本上都是與他的基督信仰連繫在一起的，可以歸類為幾個不同的面相。一是教會思想，即為在與普世教會共融的前提下，建立及維繫帶有本地色彩的教會。二是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對話，進而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容納基督信仰。三是政教關係，或者可以說于斌樞機所代表的一部分中國天主教教會，對政治問題的態度。本文從于斌樞機精彩的人生中挑選一個具有爭議的思想，就是他的愛國思想，為此他背負了許多對他的批評。本文討論的重點不是在思想本身，而是這些思想是在何種環境中孕育出來，以及如何發展變化。

## 貳、愛國思想

于斌樞機在 1919 年五四運動時，曾在黑龍江以學生領袖的身分，率隊遊行。想來他當時就是一個愛國青年，但他當時只是一個入教未久的新教友，應該尚未把他的愛國心與宗教信仰連結在一起。當他 1933 年底從羅馬回到中國，以宗座代表蔡寧（Mario Zanin）秘書及公教進行會總監督的身分服務時，他很快就展現出他結合了信仰的愛國心。在他的心目中，公教進行會除了是教友傳教的組織，也是教友們表達愛國心，參與國家事務的組織。

公進的目的，是雙重的：傳教與救國。按聖經的教訓，每人都有傳教的本分，…公進的目的在救國，救國的工夫，又在發揚公教精神，引人入教，改造人心，莫說改造人心是慢工夫，死未改妥，國家已亡，那是無妨的，雖是慢工，但既是正道，雖亡亦必興，不然者，雖興亦必亡，且一亡而不收拾。波蘭不是亡了嗎？今復興了，愛爾蘭不是亡了嗎？今又復興了。『哀

莫大於心死』，人心不死，國不會亡，亡也必興，我們要努力道德的提高，良心的培養！<sup>1</sup>

他在給宣化代牧區大修院的修生演講時說：

桑梓問題，我們怎能不注意：論我們是中國國民，已有愛國的義務，論我們是知識份子，尤其因為是傳教士，更有愛國的大責任。愛國該注重二事，一方面祈禱，求天主可憐，並保護我們的祖國，因無天主，不能做任何事；他方面盡人事，努力建設公教文化。<sup>2</sup>

這些在公教進行會所發表的愛國言論，基本背景是九一八事變，以及其後日本軍方在華北地區的逐步進逼。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7月22日，于斌也向南京代牧區的教友們發布牧函：

我們的國家已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民族戰爭隨時可以爆發。我公教信有愛國向不後人，遠事不必論，只就綏遠抗戰說吧，紅格爾圖等處的教胞不是痛快淋漓地實踐了我教愛護祖國的誠命嗎？現在的危機已不是局部的，全國各地都要受著敵人的威脅。南京教區一市十五縣更是衝要地帶，我們四萬人信仰天主的小集團身臨其境，該怎樣振作精神，去完成教友愛國的使命呢？概括說來，不外以下兩種方式：

一、祈禱和平。二、準備應戰。…

如不幸和平因黷武者而破壞，我教胞只有聽命中央，起而應戰，執干戈以衛社稷，死有餘榮。其未能派往前綫者，應從事後方工作。<sup>3</sup>

于斌的這個愛國思想看似理直氣壯，但在教會內有一定程度的爭議。首先是教會有普愛世人的思想，不希望採用暴力的手段解決人與人的紛爭，因此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必須在很嚴格的限制下，才能容許以戰爭為手段。此所謂「正義戰爭論」。其次是武器殺傷力的大幅提升，使得一次世界大戰有前所未有的死亡人數，更助長了反戰思想，部分教會人士甚且認為所謂的正義戰爭也是沒有必要的。其三是中國的教會環境，以歐洲傳教士為教會的核心，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就很難與帝國主義劃清界線。1920年代以後，又有中國共產黨的興起，在反共與抵抗外侮之間，教會很容易以無神論的共產黨為優先反對的對象，帝國主義則成了次要的。這是與一般國民不一樣的選擇次序，是爭議所在，也是于斌等一批神職人員及教友所反對的。實際上此時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區內，在政教關係方面，有兩種不同的路線，一派主張因為環境複雜，為避免

---

<sup>1</sup> 于斌，〈公教進行的目的〉，《于斌主教公進言論集》，頁 16-17。（北平：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處，1937年）

<sup>2</sup> 于斌，〈公教進行的使命〉，《于斌主教公進言論集》，頁 21。

<sup>33</sup> 于斌，〈為蘆溝橋事件告南京所屬教胞書〉，《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 1-2。（香港：真理學會，1939年再版）

惹火上身，應該在政治問題上保持中立。另外一派則認為愛國是國民義務，教友們在不違反教義的情況下應同樣盡其義務。

于斌無疑是後者，在 1938 年 8 月他更清楚的說明天主教愛國的理論：

公教的愛國觀念，不只是良心的驅策，也是天主的誠命。原來在『天條十誡』裏的第四條『孝敬父母』的條文中，就包有愛國的命令，所以我們看耶穌的言行，以及宗徒們對教友們的訓令，都可以看出公教愛國的觀念是很清晰的。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教友不愛國，不能救其靈魂，為什麼？因為他沒有遵天主的誠命。<sup>4</sup>

十誡第四條「孝敬父母」和愛國有關？他的答覆是：

我公教愛國的理論，更進一層，因為是有天主的誠命。天條十誡的第四條，要人孝敬父母，所謂父母，不只生身之父母，凡代表天主統治國家政務者，都概括在內。如果我們打開聖經去找理證，有許多處可作我這話的註腳。保祿宗徒說：「你們要服從一切主權，因為沒有一樣主權不是來自天主的。」<sup>5</sup>

### 參、 影響于樞機的時代環境

他的公教愛國觀從何而來？首先當然是教會傳統。這些教會傳統除了聖經中的教導，最主要是教會聖師對戰爭的探討。于斌在發表〈公教愛國論〉時提到以聖奧斯定及聖多瑪斯為師，他說：

我們的心境要和平，以個人說，必要時當為人犧牲自由與生命，絕無仇恨報復之心，但對於國家公益與國際公益卻有另一種看法，我們無論如何，絕不能以主動或被動作違反正義的同犯。

...

現在我們的侵略者，絕沒同我們作正義之戰。反之，他們卻把公法和人道置於不顧，而我們的戰士，及一切為保衛國家而服務的人們，卻正當得起聖多瑪斯的讚許，他曾說：「為正義而戰的，正是尋求和平者」。他又解釋說：「因為這樣作戰，他所反對的和平，絕不是吾主降世所帶來的和平者。」

我們必須小心謹慎，聖奧斯定曾說：「在作戰中你該變成和平者，好能把你

---

<sup>4</sup> 于斌，〈教宗八一通電十週年紀念告全國教胞〉，《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 65。

<sup>5</sup> 于斌，〈抗戰期中教友應有的工作—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在漢口廣播演講詞〉《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 77。于斌所引的聖保祿書信是羅馬書 13 章第 1 節，現在天主教思高聖經的翻譯是：「每人要服從上級有權柄的人，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權柄都是由天主規定的。」

所征服的人，用盡方法引他到和平幸福的路上去。<sup>6</sup>

于斌引用聖奧斯定及聖多瑪斯的理論並非隨意，而是教會有關正義戰爭論的正統思想，這些思想貫穿在他抗戰時期的各篇演講中。奧斯定在其《天主之城》中主張，戰爭的唯一目的是為了和平，終極的、理想的和平是「正義和平」，但在其過程中，「正義戰爭」是實際上可能會發生的現實。而所謂正義戰爭「應該被定義為修復傷害的戰爭。」因此被傷害者，出於自衛而被迫進行戰爭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而這也是多瑪斯·阿奎拉的進一步主張。<sup>7</sup>這些主張其後發展為教理的形式，說明訴諸武力合法自衛的嚴格條件。在現在的《天主教教理》2309 號寫道：

- 侵略者所加予國家或國際社會的傷害應是持續的、嚴重的和確定的；
- 除訴諸武力以外的其他一切辦法均顯示不切實際或無效；
- 有成功的可能條件；
- 訴諸武力不會招致比應剷除的惡，有更大的惡及混亂。現代武器的毀滅威力，在此種狀況的評估中，要求極度的明智。

在其後還提到教會並不反對保家衛國的軍人，但也尊重因為良心而拒絕使用武器者。然後聲明並不因為戰爭爆發，「作戰的雙方就因此可以為所欲為。」強調基本的道德論並不因戰爭而改變。<sup>8</sup>

于斌在思想上準備公教信仰的正義戰爭論，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及其後日本在華北的步步進逼是一個重要的刺激。身為東北人士，在海外聽聞故鄉被占領，又成立偽滿州國，可以想見必定會再次激發于斌的愛國心。但這時的于斌尚未得到鐸職，他還不適合發表什麼言論，但他會注意這時的輿論風向。陸徵祥正是他學習的對象。陸徵祥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及外交總長等職，比利時籍妻子博斐培德（Berthe Bovy）1926 年去世後，1927 年陸徵祥就進入了本篤會在比利時布魯日的聖安德隱院。陸徵祥雖在隱修，脫離俗世，但仍關心中國，聖安德隱院院長南文了解陸徵祥不是依戀中國人情世故，而是心懷祖國，常為祖國祈禱，故陸徵祥在聖安德隱院中的愛國行動是受到了解及支持的。九一八事變之後，1932 年陸徵祥在隱院之中，發揮他過去外交工作中撰寫備忘錄的長才，以法文撰寫了 *L'invasion et l'occupation de la Mandchourie—jugées à la lumière de la Doctrine Catholique par les écrits du Cardinal Mercier* 一書，中文書名為《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州國」—引梅西愛樞機 Card. Mercier 的言論依著公教信理的原則加以評判》。

<sup>6</sup> 于斌，〈公教愛國論—告南京教友書〉，《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 38-39。文內說明：「民國廿六年于斌主教因公赴歐美，曾於聖誕日致書南京區教友。原信因南京陷落不能到達，其譯文則傳遍歐美公教界。」看起來這篇文章的對象不只是南京教友，也包括歐美公教界。

<sup>7</sup> 林國華，〈西洋正義戰爭學說簡述〉，《學術月刊》第 47 卷，第 2 期，頁 165-166（上海：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15 年 2 月）

<sup>8</sup> 《天主教教理》頁 530-531。（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2002 年再版）

梅西爾樞機（*Désiré-Joseph Mercier, 1851-1926*）在我過去常看的雷鳴遠資料中稱為邁謝樞機，在 1906 年至 1926 年間擔任比利時馬林總教區

（*Archidiocèse de Malines*）總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比利時遭德國入侵，在 1914 年聖誕節，邁謝樞機發表致馬林總教區牧函 *Patriotisme et Endurance* 〈愛國與忍耐〉，以無畏的語氣說明天主教徒有愛國的權利，鼓勵教區的教徒勇敢地按照正義和平的概念抵抗侵略者。在其牧函中同樣引聖奧斯定及聖多瑪斯的說法，闡釋正義戰爭的理論與做法。這篇牧函在經過德國占領者短暫的阻撓後，也有其他教區的主教表達猶疑，但終於 1915 年 1 月 1 日在比利時全境發表，隨即翻譯為各國文字，對大戰中被佔領的比利時人心，有極大鼓舞。<sup>9</sup>不僅此篇牧函，在 1915 至 1917 年間，或是公函，或有私信，邁謝樞機持續鼓勵身邊的主教、司鐸及教友們，最終在 1918 年迎來了和平。<sup>10</sup>

陸徵祥在其陳述日本侵略中國的長文中，前半段以中國人的角度敘述自 1894 年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步步進逼。後半段就是以邁謝樞機〈愛國與忍耐〉牧函為起始，以 1914 年至 1918 年的邁謝言論，綜合說明以下幾個主題：一、天主教教義觀察點下的愛國主義；二、佔領國和他的權力在法律上的價值（這個強權基本上是不合法的，但應當忠直忍受）；三、國際審查的要求；四、正當報復的精神是一種德行；五、為戰爭和佔領而犧牲的國家所有神職班的職分；其中包含以下的小主題：（一）、尋求真理和正義來昭示國人；（二）抵抗強暴注意奸徒通敵阻止他們的逆謀；（三）、維持人心使信眾以基利斯督信徒精神忍受國難不問久暫。最後第六點是以前後教宗及國王的言論，證明邁謝樞機的原則及行動是適當的、合理的。<sup>11</sup>在文章結論中，陸徵祥慷慨激昂地寫道：

如今我敬承天主的聖召，度著修院的生活—不憚大聲疾呼，使世人再聽一聽往時梅樞機震動全世界，公正的言論，也正是出於和梅樞機一樣精神。因為這位大樞機的呼聲，在感情用事，混亂的叫囂中，和槍砲轟擊的巨聲中，能使人們諦聽著。各國對於中國往往有不滿意的論調：有的說「中國是弱國，」也有說「中國的聲訴是失敗了。」我們要回答說：「中國的聲訴是公義的，豈不見那公義的主持者，絕不會沒有最後的判決嗎？」<sup>12</sup>

于斌在抗戰時期第一次赴歐宣傳時，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名之為〈遠東戰爭〉，「此文為于斌主教民國廿六年在海外所發表之告歐美人士書，闡述我國自

---

<sup>9</sup> Edouard Beauduin, *Le Cardinal Mercier*, p.94, Tournai: Casterman, 1966

<sup>10</sup> Edouard Beauduin, *Le Cardinal Mercier*, pp.94-105

<sup>11</sup> 陸徵祥，《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州國」—引梅西愛樞機 Card. Mercier 的言論依著公教信理的原則加以評判》（上海：聖教雜誌社譯刊）該本小冊沒有譯著成中文刊行時間，推測應在 1934 年，因其刊登在《聖教雜誌》1934 年第 4 期。該文中文書名與法文書名不盡相合，按法文應為「論滿州（東北）的被侵略及被佔領」

<sup>12</sup> 陸徵祥，《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州國」—引梅西愛樞機 Card. Mercier 的言論依著公教信理的原則加以評判》，頁 48。

衛抗戰之真相，實不啻一篇國際供狀，…當時曾有英法德義匈班等國譯文，各地報界爭相轉載，…」<sup>13</sup>這篇文章除了于斌所做的一些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及政治現況的介紹外，同樣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從 1894 年開始說起，在這部分與陸徵祥《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州國」》一文雷同，只是撰寫時間較晚，日本侵略及佔領加上了 1933 年以後侵占熱河，以及 1935 年至 1937 年在華北地區軍事及政治方面的行動，並且有更豐富國際形勢的分析。<sup>14</sup>該文結尾同樣以邁謝樞機〈愛國與忍耐〉為起始，摘錄了一次大戰時期邁謝樞機鼓勵司鐸及教友的言論，最後同樣慷慨激昂的說：

余將步邁爾謝之後塵，謹遵其遺教，為解放我之良心。以我全國民眾以及一切擁護正義之名義，在諸君之前，大聲宣呼「天主之正義」。

我人在天主前之責任，即應將我人之智慧，我人之意志，我人之心靈，以及我人之一舉一動，皆須與天主之正義相符合。

我人省察時，應在天主前，考慮我人之一舉一動及一切忽略之事。

中國今日之無限信心，寄託於天主之正義及天主對我人之寵愛，因此我國被難及死亡之人，知彼等之犧牲，非徒然也。<sup>15</sup>

陸徵祥發表這篇愛國長文後，他的愛國立場才為教會人士所知。此前他在聖安德隱院是初學及暫願階段，以內修靜默為主，與外界聯繫不多。于斌雖然早在 1928 年即已晉鐸，但沒有他在這個階段與陸徵祥聯繫的記錄。比較可能是在于斌已經返國任公教進行會總監督後，在 1934 年第四期的聖教雜誌上才「認識」了陸徵祥。從兩篇文章的相似度，可以看出陸徵祥是于斌愛國思想的老師。不過他們兩人並不是愛國問題上的孤鳥，他們的共同聯繫是雷鳴遠。

陸徵祥 1933 年聖誕節以法文完成其愛國文章後，曾立即寄送給在中國的雷鳴遠百份，請他致送各界人士。又想當然耳的請雷鳴遠「送益世報及主日報各一份，並懇轉致主任，如能從速譯成中文，以廣流傳，最妙刊成單行本，插入二老相片分送，以期普及。…」<sup>16</sup>這篇文章並不是由益世報翻譯出版，《聖教雜誌》才是翻譯出版的地方，但既然是陸徵祥寄給雷鳴遠請其找人翻譯，聖教雜誌上的陸徵祥文章自然是雷鳴遠提供的。

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在上述諸人中是最早面對愛國這個主題的。1905 年他在涿州擔任總鐸時，就把教堂門口的法國國旗摘下，換上了中國的龍旗。這是使天主教與中國這個國家連結在一起象徵性的作法。在此之前他在武清縣傳教時，面對義和團運動留下的巨大創傷，就已經在思考中國天主教

<sup>13</sup> 此敘述為對〈遠東戰爭〉的介紹，見《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 8。

<sup>14</sup> 于斌，〈遠東戰爭〉，《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 21-25。

<sup>15</sup> 于斌，〈遠東戰爭〉，《于斌主教抗戰言論集》，頁 30。

<sup>16</sup> 陸徵祥，〈致雷鳴遠司鐸函〉，《本篤會修士陸徵祥最近言論集》，頁 58。（傳信書局，1936 年）該書未刊出版地，但可推想是在上海，因其為《光啟學會叢書》。其書第一篇即為《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州國」》，但書名已改為《滿洲問題評判—以公教立場評判日本侵占東四省事件》，稱錄自聖教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五期。〈致雷鳴遠司鐸函〉係該文附錄。

教友愛國的問題。<sup>17</sup>雷鳴遠到天津之後，在 1912 年參與了紅十字會救護及捐款的工作，天津紅十字會的主要成員是基督教信徒與地方紳商的綜合，是西方思想的新產物，也接收了西方民族主義的思想。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在雷鳴遠組織的宣講活動中，「愛國」或「救國」成了優先及重要的主題。更重要的是在 1915 年以後，天津法租界當局，藉口天津代牧區新建之主教座堂在老西開地區，往此方向擴張，雷鳴遠與天津紳商組織「維持國權國土會」，在 1915 年致 1916 年間，以益世報為言論機構，以商人會館為宣講基地，甚至上街遊行，罷工罷市。這是天津地區天主教教會，包括大部分神職及教友，所共同參與的愛國行動，大概也是中國天主教第一次的愛國行動。<sup>18</sup>

雷鳴遠與其夥伴湯作霖（Antoine Cotta）都是遣使會士，反對法國的行動愈發激烈以後，兩人都被法國遣使會高層懲處，雷鳴遠被調到浙江，湯作霖拒絕被調到南美洲的基多後，被褫奪神權。兩人都曾向教廷申訴。雷鳴遠在 1917 年被調到浙江後，對浙江趙保祿（Paul-Marie Reynaud）主教給他的一些限制，曾寫了一封長信回給趙主教表明立場，對於愛國問題他提到在歐洲的教會這是一種美德，雷鳴遠以邁謝樞機作為這種思想的代表，<sup>19</sup>可見這時雷鳴遠也很注意邁謝樞機的言論。當雷鳴遠回到歐洲以後，雖然有遣使會給他的限制，但他多次找機會晉見邁謝樞機，得到邁謝樞機許多同情與支持，包括由邁謝轉交教廷適合擔任主教中國籍神父的名單。<sup>20</sup>在此可以說，雷鳴遠與邁謝有關教友愛國的言論是一脈相承的，雷鳴遠的特殊之處在於中國教會的特殊處境，他所要求的是中國教友與歐洲教友有同樣的權利。

據于斌自己的回憶，他大概在 1926 年羅馬傳信大學就讀時，才和雷鳴遠有了第一次接觸，並且受其啟發。他說：「雷神父的這番話和過去的其他的傳教士說的不同，可以說其他的傳教士沒有這麼新的觀念，沒有這麼透徹的認識，使我們對自己的使命有了新的認知。」<sup>21</sup> 這個新的認知應該包括信仰不反對愛國，以及對自身文化的重視。在他見雷鳴遠的同一年，1926 年 10 月 28 日，于斌和其他傳信大學的中國修生在六位中國主教祝聖的大典上擔任輔祭，他負責協助蒲圻主教成和德，可以想像這件劃時代的大事對於于斌也有重要影響。<sup>22</sup>當時雷鳴遠也在最後一刻得到了參禮的許可，在人群中留著喜樂的眼淚。于斌 1933 年回國後，大概是 1934 年曾到河北安國耀漢小兄弟會及德來小妹妹會處參觀，

<sup>17</sup> 雷鳴遠，〈致友人湯作霖神父〉，1917 年寫於紹興，《雷鳴遠神父書信集》，頁 80-82。1917 年雷鳴遠回憶他被調到天津去的原因，他當時也和林懋德主教（Jarlin Stanislas）主教談起教友愛國的事。（台中：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1990 年 6 月）

<sup>18</sup> 陳方中，〈老西開事件—中國天主教民族主義的萌芽〉，《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頁 451-485。（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 年）

<sup>19</sup> 雷鳴遠，〈致趙主教〉，1917 年 9 月 18 日，《雷鳴遠神父書信集》，頁 203-204。

<sup>20</sup> 雷鳴遠，〈致邁謝樞機主教〉，1920 年 9 月 9 日於巴黎，《雷鳴遠神父書信集》，頁 270-272。

<sup>21</sup> 于斌，〈我心目中的雷鳴遠神父—為雷鳴遠神父百歲紀念而作〉，演講稿。收藏於輔仁大學校史室。

<sup>22</sup> 雷震遠，〈于斌總主教小史〉，收錄於《于斌樞機和他的時代》，頁 59。（台南市：聞道出版社，2021 年）

在那裏他應該是第二次見到了雷鳴遠。<sup>23</sup>可以看出于斌此時還蓄意的與雷鳴遠保持一定的距離，雖然兩人的看法如此相近。

雷鳴遠自 1927 年隨首批六位中國籍主教自歐洲返回中國後，在愛國問題上他更是行動派。1933 年初中日間爆發了長城戰役，雷鳴遠從安國代牧區動員了 260 人，包括 20 名修士及 240 名教友組織了救護隊，先到北平，然後徒步跋涉數百公里，在 3 月 25 日左右到遵化，然後到了喜峰口、南天門一帶。<sup>24</sup>類似的救護隊也在 1936 年綏遠戰役時組織，雷鳴遠率救護隊出長城經宣化，時在 1936 年 1 月 24 日，<sup>25</sup>他們選擇玫瑰營子（一個教友村）為基地，在綏遠地區參與了一些較小的區域衝突，共為時三個月之久。<sup>26</sup>

1937 年七七事變後，雷鳴遠準備以救護隊的方式隨軍作戰，在雷震遠（Raymond-Joseph de Jaegher）的要求下，雷鳴遠寫下遺囑，將耀漢小兄弟會和德來小妹妹會託付給于斌、成玉堂及樊恆安三位主教，可以看出雷鳴遠此時已對於斌有更多認識。雷鳴遠的救護隊在國軍十二師，以後升級到第三軍中，很有成效。然後在 1938 年 9 月雷鳴遠被蔣委員長電邀到漢口會晤，經過一段時間商議，決定成立「華北戰地民眾服務督導團」，由雷鳴遠擔任團長。<sup>27</sup>按雷震遠的說法，是于斌向蔣委員長推薦的。<sup>28</sup>雷鳴遠的《益世報》在日方壓力下，在 1937 年 9 月停刊，雷鳴遠寫信向于斌請求在大後方復刊，促成了 1938 年 12 月昆明《益世報》的復刊。雷鳴遠 1940 年 3 月 9 日為中共誘捕軟禁，于斌得知消息後請政府設法營救。1940 年 6 月雷鳴遠在重慶逝世，于斌接下了照顧年輕的耀漢小兄弟會的責任。凡此種種，都在實際行動中說明了于斌與雷鳴遠間日益深厚的情誼，雖然兩人都非常忙碌，沒有太多私人的往來。

另一位在中國天主教教會中宣傳愛國的重要人物是徐宗澤。這位國籍耶穌會士留學歐美，1921 年返國後，自 1923 年開始擔任《聖教雜誌》主編，直到 1938 年 8 月停刊為止。同樣的九一八事變也是他在聖教雜誌上表達愛國思維的開端，他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在這份以教會內成員為主要讀者的刊物上，提醒教友們中國被日本侵略的事實。<sup>29</sup>在七七事變以後，他有一些文章是在談論教友愛國的理論，例如聖教雜誌 36 卷 11 期有〈戰爭與愛國〉，12 期有〈天主上智亭毒之戰爭〉，是在「正義戰爭」的基礎上提出「緊要」的戰爭觀，「緊要」，意為

---

<sup>23</sup> 雷震遠，《于斌總主教小史》，頁 75。

<sup>24</sup> 雷鳴遠，〈致司塔斯保祿先生〉，1933 年 6 月 28 日，《雷鳴遠神父書信集》，頁 440-446。

<sup>25</sup> Lettre de Unden H. à Samistes (Boland A. (?)), 22.02.1936, Archives Générales Vincent Lebbe, Fond I. Tome 45, N.5. 當年農曆新年除夕在 1 月 22 日。

<sup>26</sup> 方豪，〈雷鳴遠〉，《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頁 318。（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73 年）

<sup>27</sup> 陳方中，〈左右之間—抗戰時期雷鳴遠的選擇〉，發表於「第 15 屆文化交流史：宗教、理性與激情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市：輔仁大學歷史系，2019 年 11 月 18 日）

<sup>28</sup> 雷震遠，《于斌總主教小史》，頁 75。

<sup>29</sup> 張士偉、楊磊，〈徐宗澤與抗日戰爭〉，《安康學院學報》30 卷第 2 期，頁 77。（陝西安康市：安康學院，2018 年 4 月）

「最後關頭」，「不得不」，具體指三個因素：「一、一國之獨立主權被蹂躪時；二、一國國土之完整被侵略時；三、一國當有之尊敬及光榮被侮辱時。」一旦戰爭成為緊要，則國民包括教友參戰都是絕對正當的，而且也是會得到天主祝福的。<sup>30</sup>

徐宗澤的《聖教雜誌》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是宣傳教徒愛國的重要基地。在此之前的 1929 年至 30 年間，徐宗澤在聖教雜誌上則在介紹及分析三民主義，他對三民主義的介紹與支持，是在剛恆毅授意下的行動，嘗試拉進中華民國政府與天主教會的關係。他們的想法是三民主義與教會思想不盡相合，但不代表要全盤反對，可以找出其中大部分相合之處，至於那些不盡相合之處，可以尋找某些模糊的議題，用教會觀點進行詮釋。經過這樣的詮釋，剛恆毅同意在教會學校中可以教授三民主義。這也是徐宗澤在教友愛國問題上的做法，國家對於戰爭有其與教會不盡相同的觀點，但教友可以在教會允許的狀態下，表達他們對國家的愛。徐宗澤的做法未必得到教會主流一大部份外籍傳教士的支持，這或許是雖然他學識優異、工作熱忱，在準備國籍的南京代牧區時，他也列在代牧主教的候選名單之上，但實際上他並非上海主教惠濟良（Auguste Haouissée）真正願意推選的人。<sup>31</sup>

馬相伯是另一位教友中的大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清末立憲時期即已在其言論及行動中表現出來。當馬占山率領的東北義勇軍開始武裝抗日行動時，他號召全國百姓給予支持。<sup>32</sup>當時人稱日本之侵略為「國難」，政府也在 1931 年底，宣佈將召開國難會議，馬相伯以九一高齡亦名列會議名單之內。1932 年 1 月 28 日，日軍進攻上海，馬相伯謝絕避居租界之請，仍居於土山灣危樓之中。馬相伯不只是呼籲抗日，他認為要解決「國難」，必須有正本清源之計。這種思想在其〈國難芻議〉中表現的很清楚。他以為「民治」是最基本的問題；所謂民治就是民權得到完整的保障及伸張。要達到這種境界，必須人民意識有所改變；改變之法，他以為「僅以儒佛道之法，未免太迂太晦，故莫如徑用天條十戒。」<sup>33</sup>所以他也是一位藉愛國以傳播天主教者。

因抗日及民權思想而產生對政府的不滿，在當時的知識份子中有一定程度普遍性，而馬相伯基本上是與他們立場一致的。1936 年 11 月 23 日，救國會沈鈞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時、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等所謂七君子被捕，

<sup>30</sup> 李麗麗，〈「愛國」還是「愛教」：抗戰前後徐宗澤的天主教救國觀〉，《天主教研究學報》第 5 期，頁 131-13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4 年）

<sup>31</sup> 劉國鵬，〈于斌被任命為首任南京代牧的經過、結果及影響〉，《基督宗教研究》，第 25 輯，頁 184。（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 年 12 月）按劉國鵬所看到的傳信部檔案，剛恆毅在 1933 年推薦徐宗澤任南京代牧的署理，不直接擔任代牧主教，大概是有說他太年輕的說詞。但這樣仍不被接受，傳信部「考慮到當時法國傳教士不喜歡徐宗澤」，於是派惠濟良署理，也才有之後于斌的出線。

<sup>32</sup> 馬相伯，〈勸國人慰勞東北抗日軍隊〉。〈九二老人病中語〉，收錄於朱維錚編，《馬相伯集》，頁 522、5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

<sup>33</sup> 馬相伯，〈國難芻議〉，《馬相伯集》，頁 922-925。

差不多同時，甫就任南京主教的于斌也登門親訪馬相伯，邀請其入南京居住。馬相伯自己的說法是因為有了國籍的南京主教，加上頗為賞識于斌，曾經多次對其孫女馬玉章說：「中國教會終於有了中國籍主教，我是中國人，應當幫他的忙。」馬玉章認為：「相伯公公開主張抗日救國，于斌上門，決不能公然替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策做說客。」<sup>34</sup>這話有點反著說的意味。七七抗戰開始後，他不願受敵人統治，跟著政府往後方撤退，至此他的立場與于斌就不在顯現差別了。

## 肆、 結語

于斌帶有教會立場的愛國思想是有時代性的，從 1930 年代開始，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思想上與陸徵祥的連結，而陸徵祥的思想是以邁謝樞機為印證的。雷鳴遠同樣是于斌學習欽佩的對象，雷鳴遠也是以邁謝樞機為榜樣的。同時期的徐宗澤與前輩馬相伯，也是以天主教信仰為基礎，闡述天主教徒愛國的思想，最遲至 1933 年回國後，于斌與他們多少有些接觸，思想上的契合則沒有甚麼問題。其時還有更多未在本文中介紹的國籍司鐸，例如方豪及羅光，他們剛開始展露頭角，愛國思想上與這些前輩有驚人的相似性。

這種自 1914 年左右在中國教會中成形的愛國思想，在中國教會的脈絡中其實是有爭議性的。一方面是戰爭殺傷力的日益提高，使教會以維護生命為前提，反對所有型態戰爭的聲量日漸增大。另一方面是當時中國教會的特殊狀態，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受民族主義乃至擴張為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愛其母國也是當時正當的思維，兩相權衡，於是「中立」成了一種選項。抗戰時期的情況更特殊，在國民政府、中共與日本軍方三方勢力的角逐中，中國天主教會的成員在政教關係中形成了「抗日」、「中立」及「反共親日」三種選擇。<sup>35</sup>于斌及上述諸人都是抗日分子，但在其中，于斌在與中共關係的光譜中是隔的最遠的，雷鳴遠與馬相伯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隔的較近的，因為他們比較天真，以為中共溫和土地改革者的形象是真的，因此可以與之在抗日議題上合作。另外許多的中立者，多半是外國傳教士，則認為于斌及雷鳴遠的愛國反日，有可能使得中國天主教會在無情的戰爭中受害，向駐華宗座代表蔡寧乃至教廷告狀，於是蔡寧在 1939 年 3 月發表〈勿左勿右〉公函。雷鳴遠認為其中所謂左指的是他，右則指那些反共親日者。國民政府以為這個公函是反對抗日，並不完全正確。無論如何，蔡寧轉向中立，使得他與于斌之間漸生裂痕，也增加了不少中立傳教士與于斌的距離。

于斌始終如一的堅信他身為國民應該愛國，也一直這樣做，但另一面的評

---

<sup>34</sup> 馬玉章，〈關於馬相伯創辦震旦大學及其他〉，《馬相伯與復旦大學》，頁 250。（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5 月一版）。

<sup>35</sup> 陳方中，〈左右之間—抗戰時期雷鳴遠的選擇〉，發表於「第 15 屆文化交流史：宗教、理性與激情國際學術研討會」

價則是參與政治太多。對他有這樣理解的人很多，包括教宗庇護十二，1949年對他下達了不准來台的禁令，以後這個禁令更增加為不准為中華民國政府從事政治活動。反過來看，庇護十二也可以被解釋為一位非常有政治意識的教宗，與他相比，若望二十三集保祿第六都對於斌的愛國立場相當了解，雖然他們對教會政治的理解不盡相同。

于斌樞機如果生活在今日，他仍然會如此表達他的愛國思想嗎？我想不會！強烈的愛國情感來自於民族主義，從十九世紀迄今，我們已看到這種過度情感的危害。現在還可以看到政客們操弄民粹型民族主義，這是民族主義的2.0版。要了解于斌樞機的愛國思想，必須注意的不僅是愛國這個議題，而是這個議題所代表的意義。在于斌樞機的時代，愛國代表的是教會與社會的距離，信仰必須要進入文化與國家的邊界。所以于斌如果生活在現在的時空，他關心的會是教會如何向天主聖子一樣，降生在這個世界中，與所有人同居共處。

最後，我們現在如何看待教有愛國的問題？很簡單，尊重他們的選擇，不管他們愛的是哪一個國！只是教會不要忘記，在面對外來各種形式的侵略時，教會要與本地的天主子民站在一起。